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13

新世纪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
——罗鹿鸣新工业诗歌研究

李艳萍[1]，廖利明[2]

（1.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0；2. 井冈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0）

摘要：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创作，突破了传统工业书写的既有范式，赋予新工业符号以神话色彩与生态隐喻，形成一种“技术－自然－人文”三重维度的诗意重构。其通过神话赋形、熵墒辩证与文化杂糅等写作策略，在深入批判新世纪工业文明技术异化与生态暴力的同时，又以“在地性全球化”书写姿态，努力构建人文救赎路径，为技术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范式参考。

关键词：罗鹿鸣；新工业诗歌；技术意象；生态文学；人文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119-08

工业文明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标志，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景观与精神图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急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仅催生了“世界工厂”的经济奇迹，也深刻改变了文化书写的话语体系。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像，始终与工业文明保持着复杂而微妙的对话关系。中国当代工业诗歌的发展轨迹，大致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工厂诗潮”。当时，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诗人，以流水线、机床、工人为书写对象，或歌颂机器的伟力与劳动的神圣，或揭露工业化进程中个体的异化现实。这些诗歌虽具现实批判性，但其对工业文明的表现多停留于对工业表象的直观摹写，技术符号与人性困境的二元对立是其主要叙事框架。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智造”“生态城市”等理念的兴起，工业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传统意义的工业诗歌已难以表现技术社会的多维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诗人们开始关注高速列车、智能机器、共享经济、快递外卖、航天航空、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并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新的审美意义的诗歌，霍俊明将其称之为“新工业诗歌”[1]。时至今日，新工业诗歌创作已蔚为大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各出版社已出版以李少君主编的《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为代表的新工业诗集近 30 部。

罗鹿鸣是众多新工业诗歌创作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位，近年来创作了《盾构机进行曲》《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吊塔之问》等一系列新工业诗歌。其创作以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城市发展与人文乡愁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核心主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思辨性；作品聚焦盾构机、磁悬浮列车、地铁网络、高铁等工业意象，既赞颂中国智造的磅礴力量，又揭示工业异化背景下个体的渺小与焦虑，表达出在现代性加速进程中传统文明日渐消逝的深切忧思，构筑起独特的工业美学与人文关怀相交织的诗性空间。其创作以独具特色的诗学实践，突破了传统工业书写的既有范式，赋予新工业符号以神话色彩与生态隐喻，实现了 “技术－自然－人文”三重维度的诗意重构。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创作表明，工业

收稿日期：2026-02-15

作者简介：李艳萍，女，江西萍乡人，井冈山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地域文化、闽海文献。

文明的诗意重构不仅具有可能性，更具备必要性——它既是美学上的勇敢探索，亦是文明层面的精神救赎。在技术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诗歌完全可以成为抵抗异化、重建人文精神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对新世纪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既是对新工业文明的美学回应，也为新工业诗歌乃至新时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向度，具有十分突出的研究价值。

鉴于此，本文将从技术意象的审美转化、生态反思的诗意表达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融合三个层面，探析罗鹿鸣新工业诗歌如何借助诗歌语言完成新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力求以个案研究拓展并深化新时代新工业诗歌的研究视野与理论深度。

一、技术意象的审美转化：从机械到神话

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首要任务是将冰冷的机械符号转化为具有审美张力的文学意象。罗鹿鸣的诗歌通过神话赋形、隐喻张力与符号转码三重策略，完成了对技术意象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创新，更是对工业文明本质的深度叩问：技术究竟是异化人性的“铁笼”，还是重构文明的“火种”？

（一）神话赋形：工业器械的拟人化与神圣化

在《盾构机进行曲》一诗中，罗鹿鸣通过对盾构机的拟人化与神话化书写，使其超越了普通机械工具的范畴，成为民族复兴与科技进步的象征。诗人将盾构机与 “蛟龙” “奇侠” 等神话意象相融合，赋予这一工业装备英雄般的精神气质，使之不仅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力量，更彰显了集体理想的实现：

但这款盾构机不同，脸谱嵌着五星红旗 / 马上要从中国铁建重工的车间出嫁 / 嫁到欧洲去，做波罗的海龙王的王后 / 用自己的刀盘、铁头帮助人类穿洋过海 / 这款原来一点二亿元都搞不定的怪兽 / 国产化之后，降尊纡贵，仅要三千万元 / 成为过江的蛟龙、穿海的利器、钻地的奇侠 [2]。

“蛟龙” “奇侠” “穿洋过海的利器”，这些意象的叠加，将盾构机从工程机械升华为文化图腾。“蛟龙”在中国神话中象征治水英雄，而“奇侠”则承载着武侠文化中“以技证道”的精神内核。诗人通过“脸谱嵌着五星红旗”的细节，进一步将技术神话与国家叙事熔铸于一体——盾构机不仅是穿凿地层的工具，更是民族复兴的象征。这种书写策略暗合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盾构机的“出嫁”恰似英雄离开熟悉世界、踏上冒险征程的原型叙事。“刀盘、铁头帮助人类穿洋过海”一句中，“刀盘”被赋予“铁头”的拟人化特征，暗示技术具备主体性意志；“啃土、噬岩、吞石” [2] 以排比动词强化动作的暴力性，“洞开传奇”的结局则将暴力转化为史诗性功绩。这种修辞策略消解了技术的中立性，使其成为承载集体理想的英雄符号。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促逼”（herausfordern），将自然降格为可计算的“持存物”。“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 [3] 罗鹿鸣诗歌的反策略在于通过神话叙事对技术进行“再魅化”。例如，在《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中，列车被喻为“一束射入城市深处的光”“凝固的闪电”，其“蜕化的皮搭成铁轨” [4]320 的意象，暗合北欧神话中“世界之蛇”尤蒙冈德环绕大地的传说。诗人通过自然神力与科技伟力的并置，将磁悬浮列车从“促逼者”转化为“启示者”——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现代性的神谕载体。这种神圣化的书写呼应了马克斯·韦伯“祛魅世界”的反思。当工业文明以理性主义剥离自然的神性时，罗鹿鸣试图通过诗歌重建技术的“魅化”维度。其对“磁悬浮列车无须呐喊、咆哮 / 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4]320 的描写，赋予磁悬浮技术以东方禅宗的空灵意境，暗示真正的技术革命应是“大音希声”的精神觉醒。

（二）隐喻张力：技术的诗意矛盾

罗鹿鸣的诗歌常常借助隐喻揭示技术的双重面向：技术既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在《地铁站》中，

他将地铁系统比作 “从海里上岸的章鱼”，巧妙运用章鱼这一意象，凸显出技术对城市肌理的强力介入及其对自然生态与人类个体生命的异化作用。这种诗意张力揭示了工业技术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性：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与个体的压迫。

那头从海里上岸的章鱼 / 在硬化的街道上止住了漫游 / 八爪从四面八方伸出路面 / 紧紧吸附在城市的肢体之上 / 从不合拢的嘴里，有时 / 吞噬星空，有时吞云吐雾 / 更多的是吞人吐人，夜以继日 / 对悄无声息的春夏秋冬 / 视而不见，毫不动容 / 当初吞下的少年，昨天 / 吐出来，已满头白发如雪 / 雪落大地有痕，雪落头顶无声 / 章鱼的八爪，握着了他的人生 [5]27。

诗人将地铁系统比作“从海里上岸的章鱼”，八爪“吸附在城市的肢体之上”。“章鱼”的柔软肉身与隧道的钢铁硬度形成剧烈冲突，隐喻技术对城市肌理的暴力改造；“吞噬星空，有时吞云吐雾 / 更多的是吞人吐人”的荒诞场景，则暗示了技术对人类生命的异化与吞噬。这种矛盾性在《吊塔之问》中达到顶峰：“我怎么看见了一只欲望的舌头 / 伸得越长，越感到无力 / 大楼再高，也高不过珠穆朗玛。”[6]73“吊塔”既是现代性的丰碑，又是欲望的囚笼。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一种关系”[7]。盾构机的“蛟龙”隐喻，既是民族自信的能指——“五星红旗脸谱”，又是生态危机的能指——“啃土、噬岩、吞石”[2]。这种语义的游移揭示了技术意象的内在矛盾：它既是文明进步的引擎，也是自然解体的推手。由此，折射了诗人对发展与代价关系的深刻反思。

罗鹿鸣擅长以反讽修辞揭示技术的荒诞性。例如，《电梯与人生》中，“退一步海阔天空 / 下一趟电梯还会光临”[8]，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哲学强加于机械程序，暴露技术理性的粗暴和简化。更尖锐的反讽见于《点钞机的自白》：“我无法识别牛鬼蛇神 / 缺乏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5]39 这里，点钞机在验钞功能上的精确性，反衬出其在道德判断上的无能。这种“技术全知”与“道德无知”的对比，构成对工具理性的深刻批判。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指出，技术既是人类的外在化器官——“代具”，也是异化根源——“毒品”[9]。罗鹿鸣的诗歌印证了这一辩证关系：当“芯片、机械臂、机器人与我们朝夕相处”时，人类既因技术扩展了能力边界，也因依赖技术丧失了主体性。

（三）符号转码：工业意象的文化杂糅

罗鹿鸣常将工业符号植入传统文化语境，形成时空叠印的美学效果。例如，《高铁梭子》中写道：“高铁，一只偌大的梭子 / 经纬大地。”[10] 诗人以传统织布机的“梭子”意象，隐喻高铁网络的联结功能。“万倍的速度穿梭”与“老屋里的梭子”形成互文，将工业速度融入农耕记忆的经纬交织，织就“社会大布”的现代性图景。《在湘江边温一壶老窖酒》以酒文化勾连古今，泸州老窖的“窖池”既是物质遗产，又是精神容器。诗人通过“液态历史”的隐喻，消解了技术进步与传统断裂的二元对立，将二者杂糅在一起。这种转码策略不仅消解了技术暴力的单向性，更赋予工业文明文化传承的使命。

在新近发表的《DeepSeek 的明天》中，诗人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杂糅美学。“甲骨裂纹蔓生出拓扑防火墙 / 青铜觥盛满网络攻击的毒鸩 / 却被周髀算经的微分方程悄然置换。”（九色鹿鸣朋友圈，微信号 LLM298886609）“甲骨文”的裂纹转化为网络安全的技术符号，“青铜觥”与“网络攻击”的并置，揭示了传统器物精神对数字危机的抵抗。诗中“硅基稻田里，刻蚀机正雕琢晶圆地壳 / 涌出的岩浆凝固成易经六十四卦的硅脉”一句，更以《易经·卦象》重构芯片制造的科技叙事，暗示工业文明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古典智慧之中。

在《谢岗镇的乡愁》中，“宗祠香火”与“机械手臂”共存的场景，重构了“乡愁”的地理政治学。工业不再是乡土的破坏者，而是新文化生态的参与者，正如诗人所言，“工业升级中，拓出一条绿色的通道”[5]217。这种书写挑战了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的经典对立[11]，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技术赋能的文化共生。为了避免诗歌沦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修辞，罗鹿鸣着力保持“在地性”视角。如《东莞运河》中，“农业文明的尾巴”[5]113 始终勾连工业浪潮，形成“时空叠印”的批判性叙事。

（四）技术意象的诗学功能：从异化到救赎

罗鹿鸣的技术书写始终包含对异化的警觉。例如，《金库的囚徒》中，“金钱成堆的地方不仅最安全 / 恰恰没有半点铜臭味”[5]56 的反讽，揭露了资本逻辑对人性价值的扭曲；《银行卡的前世今生》以“冰凉的数字”隐喻财富的抽象化，呼应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诗人并未沉溺于异化叙事，而是通过审美转化寻求救赎。《地铁，从我楼下经过》中，“地下的闪电可供坐骑 / 时而南辕北辙，时而上天入地”[12] 的奇幻想象，将地铁从运输工具升华为自由意志的象征；《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中“未来之光，悬挂一条炫丽而动感的彩虹”[4]320 的愿景，则赋予技术以乌托邦色彩。

罗鹿鸣站在技术革命的前沿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给予特别的关注。在 GPT 与 Sora 一经问世，便在《坐高铁的拷问》中，以极具张力的语言，展现了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深刻洞察与思考、担忧：

AI 的高速列车已经驶出 /GPT-4 正在预备一场巨风暴雪 / 脑机接口人醒了，用意念点击鼠标 / 而 Sora 突降，一把将我们推向幻境 // 人工智能的高铁已经刹不住了 / 回头无岸，故乡 / 在一夜之间会消失不见[13]。

开篇就用形象的比喻，把 AI 发展比作高速列车，将 GPT-4、脑机接口、Sora 等前沿技术的涌现描绘成风暴、幻境，生动地呈现出技术变革的汹涌态势。“人，制造非人 / 非人，会把这列高铁开往哪里 // 在跟元宇宙与未知亲近的时候 / 人与肉体、灵魂正越离越远”[13]这种细腻且富有哲理的思考，既贴合技术现实，又充满诗意想象的灵魂拷问，直击人心，引发对科技发展走向与人类命运的深度担忧。

这种救赎叙事呼应了本雅明的“灵晕”理论。在机械复制时代，罗鹿鸣通过诗歌重建技术的“灵晕”，使其从实用工具升华为审美对象。当盾构机成为“蛟龙”，ATM 机获得“自白”能力，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便成为可能。

概而言之，罗鹿鸣对技术意象的审美转化，本质上是一场“语言的祛魅与复魅”实验。通过神话赋形、隐喻张力与符号转码等方式，他既揭露了工业文明的异化本质，又以诗意想象重建了技术的伦理维度。这种书写不仅为当代诗歌注入新的美学活力，更提示我们，在技术理性主导的时代，文学仍是抵抗物化、守护人性的最后堡垒。

二、生态反思的诗意表达：熵与墒的辩证关系

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不仅需要技术意象的审美转化，更需要直面其生态后果。罗鹿鸣的诗歌以“熵与墒的辩证”为核心，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生态诗学体系，既揭示工业化对自然的暴力入侵，又通过“人造自然”的意象探索修复可能。这种书写超越了简单的环保口号，将生态危机转化为美学问题，在语言实验中寻找救赎路径。

（一）工业景观中的自然救赎：从熵增到墒减

在《愿东莞，万物各得其所》一诗中，“熵的世界”被设定为工业文明的总体语境：“热寂尚未来临之前，走出流水线。”[4]318 诗人借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隐喻工业化带来的无序性，机械重复的流水线、资源耗竭的城市扩张，皆可视作“熵增”的具象化。然而，诗歌并未止步于绝望，而是提出“墒的酿造”作为解决方案：“湿地助推海绵城市”，“森林诗歌节搭建阶梯”。“墒”在此被赋予双重意涵，既指土壤湿度——农业文明的象征，又喻指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工业文明的自我调节。“一边是熵的式微，一边是墒的酿造”[4]318 一句中，“式微”与“酿造”形成动态平衡。熵增的无序被墒减的生态修复对冲，暗示自然系统具备自我疗愈的潜能。这种辩证思维在“湿地平静的鼾声”与“彩鹮的造访”等意象中进一步强化——当工业城市通过湿地、森林重建生态网络时，自然便以“新闻事件”的形式重返人类视野。

在罗鹿鸣笔下，工业城市的自然景观常呈现“人造性”特征。《愿东莞，万物各得其所》中的“湿地”“森林”并非原始荒野，而是城市规划的产物；“银瓶山脚下，谢岗镇的乡愁”[4]318 更直接点明自然景观的文化建构性。这种“人造自然”的书写策略引发关键问题：当生态修复依赖诸如湿地工程技术干预时，自然是否沦为

另一种“持存物”？海德格尔曾警告，技术时代的危险在于将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降格为“备用物”。罗鹿鸣的回应颇具辩证色彩：一方面承认“世上本没有净土”，另一方面坚持“我们仍不放弃寻找”。在《东莞运河》中，“古老的运河返老还童”并非自然自发，而是“智造的机械手臂涂鸦现代化天空”[5]113的结果。这种“技术赋能自然”的叙事，既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也暗示生态修复必须通过技术中介实现。正如诗人所言，“农业文明的尾巴轻轻挣扎 / 系住着工业文明的浪花”[5]233。

（二）技术入侵与自然的抵抗：暴力的诗学显影

罗鹿鸣的诗歌揭示了生态暴力的“显性”特征，他常以“残缺的自然生命”隐喻生态危机。在《吊塔之问》中，“独翅的鹰”与“长臂猿伸向食物的手臂”[6]73构成触目惊心的意象群。鹰的独翅象征自然生命力的折损，而猿臂“抓住一团雾霭”则暗示技术对自然资源的虚幻占有。更尖锐的批判见于《东莞银山湿地观落日》：“铁塔串着糖葫芦”的工业景观与“湿地红晕”激烈碰撞，铁塔的直线几何理性秩序碾压湿地的曲线轮廓，最终“踢飞红尾水鸲”[5]240的荒诞场景，直指工业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灭绝性打击。蒂莫西·莫顿提出“幽暗生态学”概念，强调生态危机的不可见性与弥漫性[14]，罗鹿鸣的诗歌却反其道而行：他通过“独翅鹰”“凌波而去的黑水鸡”等高度可视化的残缺意象，将生态暴力具象化为“可见的创伤”。这种显影策略旨在唤醒读者的生态良知——当自然以“伤残者”的形象闯入诗歌时，技术理性的合法性便遭受根本性质疑。

在罗鹿鸣的生态叙事中，自然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具备抵抗能力的行动者。《地铁工地的噪音》描述机器“像一群被剥夺休息的长工”，但其“哮喘”“咯血”的拟人化痛苦，最终转化为对人类的报复：“方圆几里都惊恐悚然”[5]27。更具反讽意味的是《金融科技的魔方》：“信息流的潮水击起浪花千重”[5]21，表面上赞美科技赋能金融，实则暗示数据洪流对自然节律“潮汐”的僭越——当“潮水”沦为比特的附庸，自然便以“浪花千重”的混乱姿态反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必然导致“生态断裂”。罗鹿鸣的诗歌印证了这一判断：在《制造之都，风月无边》中，“集装箱堆积如山”与“5G 硝烟”[5]233并置，揭示工业扩张对物质与精神生态的双重破坏；“林则徐销毁鸦片”的历史回溯，则暗示当代生态危机与殖民历史的同构性——二者皆源于对自然、对鸦片的掠夺性开采。

（三）诗意栖居的可能：生态乌托邦的建构与解构

罗鹿鸣的诗歌虽描绘了乌托邦式的自然修复图景，却也暴露出其中的结构性矛盾。诗歌中的生态修复往往带有明显的技术化特质，暗合了技术在生态修复中的双刃剑效应。在追寻生态乌托邦的进程中，技术既是实现修复的重要工具，亦有可能成为环境压迫的新形态。这种复杂性警示我们，在推进生态恢复的同时，必须关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社会与阶级不平等问题，防止生态修复沦为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属特权。

罗鹿鸣的生态愿景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愿东莞，万物各得其所》中，“湿地平静的鼾声”与“彩鹮造访”[4]318构成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森林诗歌节”更将生态修复与文化活动结合，暗示“诗意的栖居”需以美学启蒙为前提。中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试点工程以来，旨在通过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城市内涝。罗鹿鸣的诗歌将这一政策话语转化为美学意象，使“墒减”从技术方案升华为文化理想。

然而，罗鹿鸣的生态叙事亦暴露了内在矛盾。在《东莞谢岗镇之夜》中，“工厂的朝阳从喜鹊窝里诞生”的意象，试图将工业与自然缝合，却难掩“重型卡车压碎夜空”[5]119的现实暴力。更深刻的困境在于：当“森林诗歌节”成为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时，生态修复是否沦为阶级特权的装饰品？唐娜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存》中呼吁“扎根的乌托邦”，强调生态行动必须直面权力结构。罗鹿鸣的诗歌虽触及生态正义问题，如《地铁工地的噪音》中“现代文明的鞭笞”[5]27，却未深入剖析环境问题的阶级与地理的不均衡性。这种美学化的生态愿景，可能遮蔽了真正的结构性矛盾。

（四）生态诗学的文化功能：从预警到疗愈

罗鹿鸣的诗歌承担着生态预警功能。在《高铁的穿越》中，“穿透河流麦地村庄”的不仅是物理速度，更是技术理性对乡土生态的切割；“屏蔽在眼睫毛外边”[15]的窗外景，隐喻现代人对生态危机的视而不见。

这种书写迫使读者直面“自然的伤口”——生态灭绝的时代，诗歌必须成为警世钟。但诗人并未停留于预警，而是试图通过语言重建生态共同体。《愿东莞，万物各得其所》中，“乔木、疏林、灌木互相扶持”[4]318的意象，暗示不同生命形式的平等共生。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在《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中进一步升华：“未来之光，悬挂一条绚丽彩虹。”[4]320技术不再是自然的对立物，而是生态美学的组成部分。

罗鹿鸣的生态诗学，在熵与墒的辩证中寻找工业文明的救赎可能。他既揭露技术对自然的暴力，又以“人造自然”的意象重构生态伦理；既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又承认技术中介的必要性。这种充满张力的书写，为当代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诗意栖居，需在技术理性与生态智慧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

三、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新工业诗学的文化基因

工业文明的诗意重构，不仅关乎技术与生态的辩证关系，更需回应文化断裂的深层焦虑。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以“在地性”为根基，将古典意象、乡土记忆与工业符号熔铸为新的文化基因。这种融合既非简单的复古怀旧，亦非对现代性的全盘接纳，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构建一种“传统－现代”的共生诗学——在机器的轰鸣中聆听历史的回声，在钢铁丛林中重建精神的故乡。

（一）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时空叠印的文化对话

罗鹿鸣在《DeepSeek 的明天》中，以“曾侯乙尊盘”与“量子密钥”的跨时空对话，重构了工业文明的文化谱系，“时空褶皱在曾侯乙尊盘里淬火成环 / 抗量子密钥在河图洛书裂变”（九色鹿鸣朋友圈，微信号 LLM298886609）。战国青铜器的失蜡法铸造技艺，与现代芯片的纳米光刻技术形成美学呼应。诗人通过“蒸馏技术提纯夸克胶子血浆”的科幻意象，将《周髀算经》的勾股定理转化为量子计算的隐喻，完成了一次“传统－未来”的诗学转译。这种转译不再局限于怀旧，而是以古典智慧激活技术叙事的灵晕。

在《金融科技的魔方》组诗中，诗人通过《点钞机的自白》揭露技术理性的道德困境。“我无法识别牛鬼蛇神 / 缺乏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5]39，点钞机的“火眼金睛”仅能验钞，却无法甄别人性的贪婪。这种“技术全知”与“道德无知”的悖论，呼应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降妖使命，暗示现代金融工具对传统伦理的消解。

《高铁梭子》以“高铁梭子”与“老屋里的梭子”形成时空互文。高铁的“东西南北穿梭”呼应织布机的经纬交织，将工业速度“万倍的速度穿梭”融入农耕记忆“拙朴的梭子”[10]。诗人以传统手工业的朴素美学，中和了现代技术的暴力因素，使“智造”成为文化传承的媒介。梭子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符号，其“经纬交织”的动作暗喻社会关系的编织。罗鹿鸣将其投射到高铁网络，既凸显工业文明的联结能力——“织紧社会的大布”，又暗示传统伦理的延续——“总让我怀念老屋里的梭子”。这种符号嫁接，实则是将“速度”重新纳入“秩序”的框架——高铁不仅是物理位移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

（二）乡土诗学的工业变形：城乡裂变的精神缝合

《谢岗镇的乡愁》中，“谢家宗祠、罗家宗祠的香火依然鼎盛”与“工业升级中，拓出一条绿色的通道”并置，重构了“乡愁”的现代内涵[5]217。宗祠象征血缘共同体的延续，而“绿色通道”则指向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二者的共生并非和谐共融，而是充满张力的并置——正如诗句所言，“这座城市墒情正好，适合生长繁华 / 无数人的渴望，在这里生根发芽”[5]217。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权力关系的物质化表达[16]。谢岗镇的“宗祠－工厂”空间结构，揭示了传统宗族伦理与技术资本主义的博弈：宗祠的“香火鼎盛”是文化惯性的延续，而“绿色通道”则是资本对空间的殖民。罗鹿鸣的诗意在于，他将这种博弈转化为“乡愁”的再生产——当机械手臂与宗祠香火共存时，乡愁不再是田园牧歌的挽歌，而是新旧力量协商的现场。

《东莞运河》以“农业文明的尾巴轻轻挣扎 / 系住着工业文明的浪花”的意象，浓缩了城乡关系的复杂性。“运河”作为农业灌溉的命脉，在工业时代被改造为物流通道，“车流穿梭，物流昼夜不息”，但其“怀旧的湖水从不干枯”[5]113 的韧性，暗示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柔性抵抗。这种抵抗在《制造之都，风月无边》中进一步具象化：“莞香香烟漫，珠江落日圆”[5]233——工业城市的景观与自然意象并置，形成“人造－自然”的暧昧交融。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城乡对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意识形态建构。罗鹿鸣的诗歌部分消解了这种对立：当“农业文明的尾巴”与“工业文明的浪花”相互缠绕时，城乡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战场，而是文化杂交的实验场。然而，这种融合是否遮蔽了真实的权力关系？当诗人赞美“工业升级”时，是否忽略了土地征用、生态破坏的代价？这是其诗学必须面对的伦理拷问。

（三）文化基因的再生：在地性书写的诗学策略

罗鹿鸣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在《问候工业之都——株洲》中，“挨近炎帝始祖时的心怯无语”将方言词汇“心怯”与工业符号“烟囱的黑尾巴”[17] 并置，形成语言层面的文化杂糅。这种杂糅在《车过衡阳》中更具深意：“一声断肠的雁鸣 / 故乡已在灯火阑珊处”[18]——“断肠”的古典抒情与“灯火阑珊”的都市意象碰撞，使乡愁超越地理界限，升华为文化身份的精神坐标。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嵌入工业诗歌的实践，可视为对抗全球化、同质化的策略。当“炎帝始祖”与“南车上的城市”在方言中相遇，工业文明被重新锚定在地域文化的土壤中，避免了“无根现代性”的漂浮状态。

《东莞谢岗镇之夜》中，“举祭人大声唱念亡者的功与善”的民俗仪式，与“重型卡车压碎夜空”[5]119 的工业场景形成荒诞对照。这种互文性在《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中进一步深化：“磁悬浮的时代无须呐喊、咆哮 / 悄悄地来，悄悄地去。”[4]320 列车的“无声”运行与传统仪式的“喧哗”形成反差，暗示现代性对地方性知识的压抑。同时，诗人通过“痕迹比飞鸟长，比飞机短”的意象，将技术纳入永恒性的追问，使机器成为新的仪式载体。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强调，仪式通过象征性行为重构社会关系[19]。罗鹿鸣的诗歌表明，工业文明同样需要仪式——当“磁悬浮列车”成为“未来之光”的现代图腾时，技术本身便成为一种新仪式，承担着凝聚共同体信仰的功能。

（四）融合的限度：文化怀旧的修辞陷阱

罗鹿鸣的文化融合策略存在潜在风险。《谢岗镇的乡愁》中，“宗祠香火依然鼎盛”[5]217 的描写，可能遮蔽传统宗族制度的压迫性，如性别歧视、阶级固化；而“机械手臂拥抱一片净土”的理想化叙事，则可能淡化工业对乡土社会的实际冲击，如人口流失、土地污染等。这种选择性呈现，使融合叙事沦为美学化的怀旧修辞。“在地性”书写的根本困境在于：当诗人将工业文明锚定于地域文化时，也可能强化地方身份的封闭性。《城际铁路，挽起长株潭》中，“人字形的城铁”试图以技术整合空间——长沙、株洲、湘潭，但“0731 的帽子”[20] 的强调，反而凸显地域身份的排他性。这种悖论提示我们：文化融合需在开放与坚守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罗鹿鸣的“传统－现代”融合诗学，以文化杂交、空间叠印与在地性书写为策略，为工业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解决方案。他通过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让历史在技术语境中复活；通过乡土记忆的工业变形，使乡愁成为抵抗异化的力量。然而，这种融合始终处于张力之中——既是文化再生的实验，也是权力协商的战场。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角力中，罗鹿鸣的诗歌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对未来的创造性许诺。

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并非一场孤立的美学实验，而是针对技术时代精神困境展开的一场文化突围。他借助技术意象的神话化、生态隐喻的辩证性以及传统符号的现代转化，不仅突破了工业诗歌现有的范式，更在文学与社会、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地带，为当代诗学拓展出新的可能。这种重构既是对工业文明的深

度反思，也是对人文价值的再度确认。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表明，诗歌不只是现实的映照，更是未来的构想——通过神话赋形、生态辩证与文化杂糅，工业文明能够在语言的炼金术里重获诗性维度。罗鹿鸣的新工业诗歌启示我们，在技术理性笼罩的铁幕之下，诗意栖居依然可行——只要文学始终坚守对异化的抵制、对共生的向往，以及对人性温度的守护。

参考文献：

[1] 宾阳 . 霍俊明：“新工业诗歌”的关键在于“新”[EB/OL]. [2026-01-15]. https: //www.zhbch.org.cn/wenhua/4819.html.
[2] 罗鹿鸣 . 盾构机进行曲 [J]. 阳光，2024(2)：162.
[3] 海德格尔 . 海德格尔选集 [M]. 孙周兴，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3.
[4] 李少君 . 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
[5] 罗鹿鸣 . 屐痕斑驳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
[6] 罗鹿鸣 . 吊塔之问 [J]. 阳光，2024(2)：73.
[7] 罗兰·巴特 . 神话修辞术 [M]. 屠友祥，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35.
[8] 罗鹿鸣 . 电梯与人生 [J]. 鸭绿江·华夏诗刊，2020(3)：277.
[9] 贝尔纳·斯蒂格勒 . 技术与时间 [M]. 裴程，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67.
[10] 罗鹿鸣 . 高铁梭子 [N]. 长沙晚报：橘洲副刊，2018-11-20(7).
[11] 雷蒙·威廉斯 . 乡村与城市 [M]. 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3.
[12] 刘羊，风别云 . 诗歌里的长沙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69.
[13] 罗鹿鸣 . 磁悬浮列车，浮在城市之上 [J]. 郴城，2024(8)：44.
[14] 蒂莫西·莫顿 . 幽暗生态学：论未来共存的逻辑 [M]. 白天明，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8.
[15] 徐正华 . 中国新诗百年精选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227.
[16] 亨利·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02.
[17] 罗鹿鸣 . 问候工业之都：株洲 [J]. 阳光，2024(2)：72.
[18] 罗鹿鸣 . 高铁梭子 [N]. 长沙晚报：橘洲副刊，2018-11-20(7).
[19] 维克多·特纳 . 仪式过程 [M]. 柳博赟，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74.
[20] 罗鹿鸣 . 城际铁路，挽起长株潭 [J]. 诗刊，2018(7)：71.

Poetic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A Study of Luo Luming’s New Industrial Poetry

LI Yanping[1], LIAO Liming[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0, China）

Abstract：Luo Luming’s new industrial poetry breaks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writing, imbuing new industrial symbols with mythological hues and ecological metaphors, and thereby forming a poetic reconstruction along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nature-humanity”. Through writing strategies such as mythic shaping, entropy dialectics, and cultural hybridity, while deeply criticizing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violenc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writing stance of “localized globalization”, he also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path of humanistic redemption, providing a paradigm reference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Keywords：Luo Luming; new industrial poetry; technological image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humanistic redemption

责任编辑：黄声波